

SW 百花散文书系·古代部分

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蘇軾



散

选集



百花散文书系·古代部分

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

# 苏 轼 散 文 选 集

崔承运 选注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苏轼散文选集/崔承运选注.—3 版.—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6

(百花散文书系.古代部分)

ISBN 978—7—5306—5413—2

I. 苏... II. 崔...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北宋 IV. I 26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6294 号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140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3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1.00 元

## 编辑例言

一、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它和诗歌一样，同是中国古代文学最主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古代散文优良传统，以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特编辑这套“中国古代散文丛书”，作为“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

二、散文文体范围，代有嬗变，古今不同。本丛书所选，以抒情、记述体等文学性较强的散文为主。入选作家上起自先秦，下迄于清代。按不同作家分别成册。各书篇目排次，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以便读者了解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演变轨迹。

三、本丛书每书分两部分：一为论文，内容除简介作者生平、文学活动外，着重结合选入本书的作品，分析、评述其散文创作思想特别是艺术特色、散文创作发展历程及影响。一为散文，每篇均附加题解、注释。

四、论文部分力图与散文部分互补共济，以论文帮助

读者对所选散文提高到理性认识,又以所选散文来深化读者对论文的感性认识,两相印证,使本丛书除选注散文佳作供阅读之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兼具作家论乃至古代散文史的作用,既不同于一般散文选本,也有异于一般的古代散文史而自具独有的特色。

五、每书所选散文,除了作者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作外,还照顾到作者不同时期、不同题材、风格的文学性散文,以便体现作者散文创作发展道路。

六、题解除解释文题中有关词语、专门名词等和说明写作时间、出处、版本等外,还对作品写作背景、思想价值、艺术特色以至艺术手法等,加以简明的评述。

七、注释以疏解难字、难词以及典故、职官、器物、人名、地名等为主。对其重要者、用法特殊者,并援引出处或例句,以便读者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

百花文艺出版社

## 苏轼和他的散文

崔承运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一个年仅六周岁、刚入乡校的儿童,从乡先生那里窥见了当时的名士、人称徂徕先生的石介(守道)写的《庆历圣德诗》,不仅过目成诵,使先生称奇,更可奇者,是他向先生询问诗中所颂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之事。当时朝中守旧派大臣吕夷简、夏竦罢官,改革派人物韩琦、富弼等上台,是朝廷中的一场政治斗争。先生见一个总角童子询问如此重大事情,就漫不经心地回答说:“童子何用知之。”不料这儿童竟强硬地反问道:“此天人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如此义正词严的反问,把先生惊呆了。这个口出奇言的童子,正是后来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大文豪苏轼。

苏轼自幼接受母亲的教诲,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觉以儒家代表人物为典范,学习他们勇于用世的精神和“独立不倚”、“刚正不阿”、“危言危行”、“犯

颜敢谏”的德操与名节；又在父亲苏洵的熏陶下，文章洗尽五代以来绮靡柔弱的文风，写得雄奇壮阔，新颖实用。超乎寻常的天赋和才气，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纯真刚正、放言无忌的性格，既使他成了轰轰烈烈、享誉当世的名士，又注定了他坎坷不平、灾祸迭出的一生。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自号东坡居士。他于宋仁宗在位的第十五年，即景祐三年（1037）生于四川眉山县纱谷行私第；宋徽宗即位的第二年，即建中靖国元年（1101）逝世于常州。这段时间，表面看来，是宋朝比较“承平”的时期，但却是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年代。自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辽订立“澶渊之盟”以来，每年向辽和西夏输岁币银及绢匹以百万计。腐败无能却又以天朝自居的宋室君臣，无力抗争却说什么不屑与“犬豕豺狼相较”，纳银进贡是“大富家舍施乞儿”。宋室的苟且偷安，助长了辽、西夏奴隶主的掠夺野心，弄得边尘不静，百姓疲惫，国力空虚，宋王朝呈现风雨飘摇之势。仁宗当朝的庆历年间，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了“庆历新政”，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少年苏轼对新派人物十分崇敬，特别将欧阳修、范仲淹引为师表，自觉接受其政治主张和文学影响，所以，一入世便成为立志革新的青年政治家和文学改革家。嘉祐二年（1057），苏轼试于礼部，作《刑赏忠厚之至论》，主考官欧阳修、参评官梅尧臣，以为它脱尽五代、宋初的浮艳艰涩之风，十

分赏识。欧阳修曾惊喜地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果如欧阳修所言，在应制科时所写“霆轰风飞，震伏天下”的二十五篇策论中，既显露出“奋厉有当世志”的政治家气度，又展示出论辩滔滔、豪健清雄的文风，从此名震四方，成为宋代文坛上的一颗巨星。

如果说《刑赏忠厚之至论》是他散文创作之起点的话，那么，嘉祐四年与其弟苏辙陪同父亲苏洵进京时，一路所写《南行集》里的部分作品，便是他一生近三千首诗歌的发轫之作。这年九月，“三苏”父子由眉山登舟，沿岷江入长江，穿越三峡，顺流而下，历时三个月，年底到达荆州（今湖北省江陵）。一路上，父子三人游览了大江两岸的名胜古迹，观赏了巴蜀湘鄂的壮丽河山，凭吊了古代著名诗人的遗踪，体察了沿江一带的风土民情，大有“道路半年行不到，江山万里看无穷”（陆游《水亭有怀》）的气概。他们兴致满怀，吟诗撰文，共得百篇，合成一集，题名《南行集》，其中苏轼诗四十首。那些准确地捕捉住江山神韵、生动地描绘出三峡风光的诗篇，第一次显示了年轻诗人的出众才华。

在苏轼进入仕途的最初十年，可以说是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时代。这期间他曾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事、大理寺丞、殿中丞除直史馆等职。但到宋神宗赵顼即位，任用王安石大刀阔斧进行变法的时候，苏轼因不同意王安石的激进作法而遭到冷落。于是他请求外调，先任杭州通判，后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先后共七年。这期间，王安石厉行新法，取得了一些成效，也带来



了一些弊端。熙宁九年(1076),在变法派内部斗争与保守派攻击下,王安石第二次自请罢相,一些投机变法的分子置国家大事于不顾,结党营私,倾轧报复。而敢于“危言危行”、“忘躯犯颜”的苏轼竟成了他们政治倾轧的牺牲品。元丰二年(1079),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专从苏轼诗中寻章摘句,罗织罪证,以“指斥乘舆”、“讪谤朝廷”罪将苏轼追摄入狱,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罪名赫赫,一时间亲朋震恐,苏轼自己也感到性命难保,在给苏辙的诀别诗中写道:“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所幸神宗无意杀他,加之亲故营救,三个月后结案出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苏轼至黄州后,先居僧寺定惠院,与和尚起伏就食,后于长江边临皋亭定居。次年又由老友马正卿向黄州府求得城东旧营地一块,躬耕田亩,“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间”,并在市民、官绅中交了不少新朋友。特别是,所居对岸武昌、樊口,山水佳胜,有蜀人王文甫兄弟及潘生相与往来,十分亲热,每造访遇风涛阻隔,不能即归,就滞留数日,饮酒畅谈,十分快活。居黄四年,虽旷达自适,但不忘现实,除撰写《易传》、《论语说》等学术著作外,还创作了一大批关心人民与国家的作品。单就散文而言,达到了一生创作的最高峰,脍炙人口的前、后《赤壁赋》,就是这时期的代表作。

元丰七年(1084)三月改贬汝州。他先南下九江,游览庐山,之后北上,经过金陵时,拜访了罢相闲居的王安石,于王安石私第居住一个月,二人悠游山水,谈心和诗,十分欢洽。他们二人同出欧阳修门下,同样富有才识和

远大抱负，又同在官场倾轧中被排挤出朝廷，这使他们同病相怜，感情趋于和解。原来就一直保持着的私交，这时更加深厚了。

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故，年仅十岁的哲宗赵煦即位，其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她一手推翻新法，起用保守派人物司马光、吕公著等人。苏轼被作为旧党起用为登州太守，旋诏回朝，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旧党虽然给他连升三次，他却对司马光等人不问利害全盘废除新法的作法不能苟同，尖锐地提出了反对意见。在朝四年，深为旧党腐朽官僚所忌恨。司马光死后，旧党分裂，人事矛盾加剧，苏轼因直言敢谏、刚正不阿，在朝廷政治斗争中多次横遭构陷，于是请求补外。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元祐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京都，但由于受旧党人士贾易、赵君锡的排斥，不愿久居京城，一连七上封章，乞除一郡，获准除知颍州。在颍不到半年，又改知定州。其间，他辗转迁徙，“团团如磨牛”。

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他一收回大权便改弦更张，砸烂了他祖母的旧班底，再次实行变法，起用新派人物。然而，改革已经有名无实，一批政治投机分子章惇、吕惠卿、曾布、蔡京等人，以所谓新党面目出现，打起绍述熙宁、元丰的旗号，恣意报复元祐旧臣。苏轼本来屡受元祐旧党的疑忌和排挤，这时却被当做旧党要员加以打击。绍圣元年(1094)四月，他被撤掉了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的官衔后，一月之内连贬三次，最后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广东惠县)安置。那些热衷于

党争的官僚集团,对苏轼一再迫害仍不解气,于是在绍圣四年(1097)四月再把他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苏轼只好告别家人,与幼子苏过负担过海,来到海南黎族聚居的荒蛮之地儋耳,在桄榔林中筑屋存身,过起了“食芋饮水,著书为乐”的谪居生活。直至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宽宥元祐旧臣,苏轼才得内迁。七年龄外的流放生活没有把他压垮,不料在北归途中染病于常州。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逝世于常州孙氏宅中。北宋文坛上的一颗巨星溘然陨落了。

## 二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作家的创作道路不能不制约于生活道路的发展变化。苏轼经历了北宋仁、英、神、哲、徽五个帝王的时代。在此期间,社会危机不断加剧,政局反复多变,朝中党争此起彼伏。苏轼因秉性刚直、放言无惮而成为腐败官僚们互相倾轧的牺牲品,致使他政治上成败荣辱大起大落。两次在朝、两次外任、两次贬官的坎坷生活,使他的思想情感也几度发生重大变化,其文学创作也明显地呈现出阶段性。嘉祐、治平年间,初入仕途,苏轼以青年政治家面貌出现。由于在入世之前早已打好坚实的文学根底,因而一开始便有横空出世之势。这期间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散文创作上,《进策》二十五篇、《思治论》等,论辩滔滔、汪洋恣肆的才气,风节凜然、豪迈进取的政治改革家气派,一时轰动朝野。

两次在朝任职，是他创作的歉收期。激烈动荡的宫廷斗争，永无休止的繁忙案牍，占去他的大部分精力，使他难以致力于文学创作，名篇佳制寥寥无几。两次外任，是他文学创作的发展阶段。自请外任，是想摆脱险恶的政治旋涡，在基层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以便实现自己“胸中万卷，致君尧舜”的宏伟理想和建功立业、经世济时的远大抱负。所以在思想情绪上尽管时时流露出朝中党争带给他的抑郁不快，但总的精神面貌是超迈进取、积极热情的。他每到一地都深入下层，了解民隐民情，熟悉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对百姓，征询疾苦，因法便民；对朝廷，则直言正议，指陈得失，提出自己的政见。在杭州任上，曾亲自检查湖洲堤岸，巡视富阳、新城、于潜等县。知密州时，一入境便发现官吏们隐瞒蝗旱灾情，百姓苦不堪言，于是立奏朝廷，请求减免赋税，组织百姓生产救灾，自己带头以杞菊为粮，自救度荒。知徐州时，黄河决堤为患，他“庐于城上，过家不入”，指挥军民冒雨抢修堤坝，鏖战七十多天，保住了徐州。他不仅关心那里的农业生产，而且组织开发过白土镇煤矿。对人民生产、生活的深入了解，给他的创作带来了一股新鲜气息，使他有可能写出一批反映民情民风和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诗文。元祐年间第二次外任时，在杭州以工代赈，开浚西湖，筑成长堤，治堤种荷，夹岸植柳，清除了污染，美化了杭州，同时也写下了一大批描绘杭州美景的著名篇章。两次外任丰富了社会阅历，开扩了创作视野，扩大了创作题材，这不仅使他在诗词领域获得巨大成就，而且在散文创作方面也硕果累累，除一大批政论、史论之外，还有一大批形象生动、

文采斐然、给人以哲理性启迪的记叙文和杂文，如《喜雨亭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等传诵千古的名篇。

“乌台诗案”是苏轼生活和创作道路上的一块界石。这次几乎致他于死地的文字狱，对他是一次沉重的政治打击，使他的社会观念、人生态度、思想情感以及创作风格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此开始的长达十馀年的贬谪生活，使他经历了得失骤变的政治沧桑，饱尝了荣辱无常的人生苦涩。这不仅没有使他意志消沉，相反，却使他的个性与才学在同现实生活的碰撞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华。精神世界的进一步丰富，推动他的文学创作走向了顶峰，就散文来说，自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沿着苏轼的生活轨迹尽管可以为他划分出若干创作阶段，但就其艺术风格而言，各阶段的创作都体现了多样性的统一。为此我们不做条分缕析的解剖，仅从其创作心态和艺术表现类型来看，大体分为两种：任职时期主要表现为“对世人的关怀”；贬谪时期则主要表现为“自我的抒解”。

在任职期间，无论在朝中还是外任，都不失一位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这期间，建功立业的雄心、恃才狂放的性格、急迫地表现生活的激情，以及敏锐而准确地捕捉形象的功力，使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在多样化中保持着劲健豪放的风格特征。他的表兄文同在《往年寄子瞻》诗中回忆他们熙宁初年在京都的一段生活时写道：“虽然对坐两寂寞，亦有大笑时相轰。顾子心力苦未老，犹弄故态如

狂生。书窗画壁恣掀倒，脱帽褫带随纵横。诙谐歌诗踞文字，荡突不管邻人惊。”其狂放性格宛如李白再世。其作品大都留下了这种狂放不羁的投影，它们也都写得左右逢源，旋转圆通，笔墨纵横，风采俊逸，给人以酣畅淋漓的快感和赏心悦目的享受。

然而，“乌台诗案”迅猛地改变了他的创作心态。突如其来的政治打击和精神折磨，使他心理上猛然失衡，思想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之中。此后的生活内容，除了东坡躬耕，访友出游，便是参禅悟道，闭门思过。青年时代以标榜释道作为显示个人志趣超远的风雅之举，这时却不但风雅而且十分难堪地与现实生活结合了；只不过这种结合，没有使他停止创作，而是使他的文学之笔由描绘外部世界而转向了内心，由对“人世的关注”而变为“自我的抒解”。创作的原始动机成为对个人一生遭遇的省察与检点，其文思常常返回到个人生命中的重要事件，并以此为始点，寻找出生命历程中理想与挫折、感情与意志所经由的脉络，并循此脉络去表现个人复杂的心理矛盾和精神苦闷。然而，一生旷达的苏轼，表现个人内心矛盾和精神苦闷并不是最终目的，目的是使之得到抒解，以便重新寻找个人的价值，并确认自我在家庭里、在朋友中、在社会上乃至在宇宙间的形象与地位，同时为自己的精神找到安息之所。这期间，其复杂的心灵，成为他主要的表现对象。丰富的内心世界一经与旷达个性相溶解，奇迹般地将他的创作推向了顶端。达观地对待苦难的态度与对人生美好事物的执著追求相辅相成地结合在一起，使笔下的形象在天涯沦落的悲苦之中燃烧着炽热的积极向

上的情感，格调之沉郁、情味之深宛，给人以铭心刻骨的感受。谪居中，对“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的歌颂（《卜算子》），对地处江城幽独而高洁的海棠的颂扬（《定惠院海棠》），对承天寺洁净空明的夜月的赞美（《承天寺夜游》），对安国寺皈依佛僧时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染污自落、表里恹然的精神境界的眷恋（《黄州安国寺记》），对质朴而淳厚的海南老人的厚爱（《书海南风土》），对茅封草长的枕榔庵的礼赞……都那么内涵丰厚，恹然旷远，特别是以赤壁为题材的作品，更是集中反映这一特点的典型代表。它们既是作家精神苦闷的宣泄，又是他从想像中对现实郁积的抒解，同时，也是他急切要求表现个人审美理想的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的外现。

### 三

在唐宋八大家中，最受推崇的是韩、柳、欧、苏，有散文四大家之称。而苏轼散文又代表了北宋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对中国散文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首先，他把北宋古文运动推向了顶峰。五代、宋初以来文风凋敝，杨亿、刘筠、钱惟演等西昆派，弄纤使巧，浮华侈丽，搞得散文创作严重脱离生活。宋初古文运动致力矫正之，却又出现了“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苏轼《谢欧阳内翰书》）的新的弊端。欧阳修力矫新弊，继承韩柳散文平易晓畅的一面，创造了条达舒畅、摇曳多姿的风格。苏轼则以自己扎实的功力、奔放的才情，沿着平易自然的路子，开辟了散文创作的新天地。他

不仅反对新老流弊,而且反对空谈心性的道学文字和千人一面的科场笔墨。他主张以“识度为先”,以“体用为本”,针对现实,言之有物,无论谈史、论今、叙事、抒怀,皆应有为而作,用自己的实践,把北宋的散文创作推向了顶峰。

苏轼的散文之所以能够享誉古今,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内涵的深厚,特别是他以其政治家的敏锐、哲学家的才思、文学家的天赋,于古代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中弹奏出的博大深邃的儒家人文精神和积极的参与意识。儒家思想的三大支柱“泛爱”、“民贵”、“仁”说,深深地影响了苏轼。他的作品,无论描绘自然还是描写社会,都透过自然与社会体现出人与人性这一伟大主题;他喜爱山川景物、日月风光,是为了捕捉大自然的灵气以充实人的精神世界,使人更显其万物之灵的本色;他一生写了大量的人物传略、铭文、碑记,是为了挖掘和弘扬人的崇高品格,以使人的伟大之处永放光芒;特别在他的晚年,在严酷的政治迫害和贫穷折磨下创造的不朽的《雪堂记》、《赤壁赋》、《菜羹赋》、《飓风赋》、《枕榔庵铭》等千古之作,更是对人的崇高价值的不可磨灭的赞歌。

苏轼的散文不仅肯定并赞美人的价值,而且自觉颂扬理想的独立人格。在他青年时代的作品《屈原庙赋》中,对屈原人格美的高度赞扬,对屈原那横而不流、独立不倚的气节的由衷的敬佩,对屈原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为真理而献身的伟大探索精神的崇敬,都标志着青年苏轼已经树立起追求完美的独立人格的坚定信念。他遵行“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



(《御试制科策》)的哲学,总是使自己“涤荡振刷卓然有所立”(同上)。这使他的创作的视角始终关注着自然万物的支配者、天地之间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独立价值和品格,他通过自己文学的巨笔始终高唱着独立人格的颂歌。

他一生把文学创作看成千古之事,热情讴歌别人的完美人格,也坦诚地抒发自己的真性情。无论是屈原、陶潜、李白、杜甫,还是范仲淹、欧阳修,凡见于他的笔端,无不放射着理想人格的光辉。他性格耿介,表里澄澈,讲求风节,不愿“视时上下而变其学”(《送杭州进士诗序》),故常为奸佞所害,然而他明知“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次韵张道安读杜诗》),却始终保持着高贵的操守,文章写得放言无忌,雄奇壮阔,那么富有独创性与个性化。他反对“屈折奉曲以合绳墨”(《送张丘秀才序》),所以文章的分合、收纵、跌宕、顿挫,皆驾馭自如,自然贴切,毫无隐晦;行文汪洋恣肆,波澜起伏;驰骋议论,放言无忌;造语奇警,立意新奇。李涂《文章精义》云:“韩(愈)如海,浩瀚恢宏;柳(宗元)如泉,澄澈隽永;欧(阳修)如澜,容与闲逸;苏(轼)如潮,奔腾倾注,波澜层出。”正如苏轼在《文说》中自称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沈德潜在《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凡例中说,苏文“一泻千里,纯以气胜”。这“气”,即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亦即儒家对理想人格的哲学概括。

热情的参与意识和积极的入世态度,以及急于表现